

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

(苏) Н·П·沙斯季娜 著

0.512

2

1

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

〔苏〕H. П. 沙斯季娜著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教师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Н. П. ШАСТИНА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ПОС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XVII ВЕКА**
Изд.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8

内部发行

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

[苏] Н. П. 沙斯季娜著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教师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6 1/4 印张 155千字

1977年9月第1版 197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402 定价: 0.60元

《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

中译本序言

《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原书于1958年由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作者是H. П. 沙斯季娜，其著作除本书外，还著有《苏联的蒙古学发展概要》、《东方各国旅行记》及参加编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等书。

本书着重叙述了沙皇俄国1604—1691年近百年间向我北蒙地区侵略扩张时，不断派遣“外交使节”到我喀尔喀蒙古诸部进行分裂、颠覆活动的情况。此外，作者还叙述了俄国全权大使费·阿·戈洛文于缔结《尼布楚条约》前后在蒙古地区活动的详细经过。书中引用档案等史料较多，对研究十七世纪沙俄入侵我国蒙古地区的历史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作者是一个拜倒在沙俄扩张政策面前的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她肆意颠倒是非，竭力美化沙皇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歪曲和篡改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历史，制造了种种反动谬论。

作者在叙述十七世纪俄国与我国蒙古诸汗的关系时，竟然把蒙古称为“国家”，把清朝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制止沙俄在我国蒙古诸部中制造分裂和颠覆的斗争，歪曲为“干涉蒙古内政”，甚至胡说贝加尔湖一带是沙俄“和平开发的新地区”，诬蔑中国“对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即黑龙江）流域提出了领土要求，侵略俄国人已定居的地区”，等等。自己侵略别国的领土，却反过来说成是被侵略，真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

戈壁沙漠以北包括贝加尔湖一带在内的北蒙地区，历史上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远的不说，在七世纪中叶，唐朝政府就在这个地区设置安北都护府(瀚海都护府)管辖。安北都护府下设许多都督府和州。其中有设在叶尼塞河与安加拉河会合处以南地区的坚昆都督府，设在杭爱山西麓直至金山(阿尔泰山)之北的狼山都督府，设在贝加尔湖一带以及以北地区的玄阙州，设在仙萼河(色楞格河)流域的仙萼州等。十三世纪，蒙古贵族从这里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政府。贝加尔湖一带及其以北地区，属元朝政府设置的岭北行省管辖。元亡以后，贝加尔湖一带归蒙古瓦剌部和鞑靼部管辖。十五世纪初，瓦剌首领马哈木向明朝政府请求封爵。明朝政府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同时还封另外两个瓦剌首领为贤义王和安乐王。此后又封鞑靼首领阿鲁台为和宁王、俺答为顺义王。明朝末年，戈壁沙漠以北包括贝加尔湖一带，是蒙古喀尔喀部和布里亚特部的住地。喀尔喀分为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三部。布里亚特属喀尔喀诸汗管辖。1638年(清崇德三年)，清入主中原以前，大漠以北，西自阿尔泰山至贝加尔湖一带地区，已为其所统辖。清朝取代明朝统治全中国以后，对蒙古族原来的管理体制加以变更，改为盟旗制度。同时废除济农、诺颜等旧有官号，由清朝授予蒙古族封建领主以王、公、贝勒、贝子、台吉等爵位。清朝政府还在外蒙古地区设将军(驻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驻库伦)和参赞大臣(驻科布多)管辖。上述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戈壁沙漠以北包括贝加尔湖一带，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种把蒙古说成是“国家”，把贝加尔地区说成是沙俄“和平开发的新土地”，完全是对历史的无耻篡改和捏造。

十七世纪时，蒙古诸部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有的部在某些时候也出现过割据分裂的叛乱活动，但这些都是我国国内矛盾的一部分，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的

中央政府——清朝政府完全有权处理它们所管辖的蒙古诸部的
事务和矛盾，与所谓“干涉蒙古内政”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
干涉别国内政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扩张胃口很大的沙皇政府，正
是它背着中国清朝政府向蒙古诸部不断派遣“外交使节”和其他各
种人员进行颠覆活动，直至武装侵略。本书的作者却反咬一口，将
“干涉内政”的大帽子强加于中国，真不愧是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
忠实辩护士。

在中俄关系史上，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沙皇俄国，而是扩张成
性的沙皇俄国野蛮侵略了中国。就在十七世纪，沙俄不仅侵略中
国西北边疆和黑龙江流域，而且还侵入了贝加尔湖一带中国北部
边境，对我国蒙古等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本书的作者在
胡说什么中国“侵略俄国人已定居”的贝加尔地区的同时，竭力美
化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为之涂脂抹粉，吹嘘沙皇政府的政策“在
于保持同蒙古诸汗的睦邻关系”，“在经济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亲
密关系”，甚至起劲地把对外疯狂扩张的老沙皇打扮成“仁慈”的君
主，把沙俄侵略者的烧杀淫掠说成是“传播文化”、“起了进步作
用”，简直被捧上了天！

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说：“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
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
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18 页）沙皇俄国与我国蒙
古族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睦邻关系”、“亲密关系”，而是不折不扣
的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沙俄对我国蒙古诸部的侵略，采取了“和
平”诱降和武装占领两手。它不断派遣“外交使节”到蒙古诸部进
行活动，使出了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组织颠覆，策动叛降等种种卑
鄙手段，“有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恩格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17
页）。同时，它出动武装大肆入侵，占领我国蒙古地区。沙俄侵略军

每侵占我国蒙古一块土地，便“对蒙古居民百般欺凌，抢劫掳掠，殴打致死”。他们想方设法巧立名目进行掠夺，除强行向蒙古人民征收毛皮实物税外，仅因“侮辱使节”罪，就规定要“赔偿五峰骆驼、十匹马、十头公牛、二十只母羊”，其剝削掠夺十分残酷，那里有什么“经济互利”可言，那里是什么“亲密关系”。对于沙俄的侵略和犯下的种种罪行，我国蒙古族的王公曾不断予以揭露和表示抗议。他们指出，沙皇的人“都是一些骗子，你们向我们国土派来使节，而随你们之后，带来的是战争”。严正地抗议：俄军“攻打向我们缴纳毛皮实物税的人，劫走了很多的妇孺和财产，捣毁向我们缴毛皮实物税的布里亚特人的住处，使我们的人不得安生，四处逃亡，无法就业”。蒙古族王公“断然拒绝当俄国属民”，强调指出：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服从清朝政府的命令，“我们的斡齐赉汗（即土谢图汗）同大清皇帝一致行动”。沙俄侵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激起了蒙古族人民的愤怒反抗，从侵略军踏上我国蒙古土地的那一天起，蒙古喀尔喀部、布里亚特部以及准噶尔部等都不断地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武装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例如，1668年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在谢伊贡吉的领导下，曾经攻打贝加尔湖以西被沙俄侵略者占据的巴拉甘斯克、上连斯克和伊里姆斯克。1674年，三千布里亚特人在乌达河谷同沙俄侵略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他们面对着用大炮、火枪武装起来的侵略强盗，毫不畏惧，英勇奋战。在转移到鄂嫩河上游后，仍然继续坚持斗争，不断袭击侵略军。1682年，色楞格斯克附近的蒙古喀尔喀部爆发了抗俄起义，打死打伤许多沙俄侵略军，夺回许多被掠夺去的牲口。我国蒙古族人民为卫国保家反抗沙俄侵略压迫的斗争，此伏彼起，狠狠地打击了入侵的敌人，使沙俄侵略者胆战心惊。历史是最好的见证。沙俄侵略者对中国蒙古诸部穷凶极恶的侵略和奴役，蒙古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有力地戳穿了所谓沙皇政府对我国蒙古族的“亲密关系”、“和

平原则”、“传播文化”等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页）沙斯季娜之流把这些谎言拿来大肆宣扬，恰好暴露了她的叛徒嘴脸。

此外，本书作者还用了不少篇幅记述了缔结《尼布楚条约》的沙皇全权代表戈洛文在蒙古地区的活动，吹捧他在尼布楚谈判时“成功地避免了中国使臣提出的过高要求”，“捍卫和保护了国家利益”的“英雄”，等等。而事实是，在尼布楚谈判时，真正提出过高要求的根本不是中国，而是戈洛文自己，是沙皇政府。正是这个戈洛文秉承了沙皇的意旨，蛮横无理地提出要以中国黑龙江作为两国边界，图谋侵占黑龙江流域以北大片中国领土。中国方面的要求不仅完全合理，而且还主动作出了重大让步，把贝加尔湖以东到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土地让给了俄国，从而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戈洛文是个沙俄扩张主义分子，是沙皇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得力工具。他不但在尼布楚谈判中提出侵占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还在他前往尼布楚参加谈判的途中，即带着大批俄军长期停留在我国喀尔喀蒙古地区，干着罪恶的侵略勾当。他大肆炫耀武力，威胁蒙古王公，要“各台吉都知道沙皇拥有大量军队和英勇善战的人，现在由全权大臣率领，如果他们的臣民不愿遭到毁灭，必须立即归顺沙皇”。他还策动中国准噶尔部噶尔丹叛国投俄，煽动他“攻打蒙古人，将其彻底消灭”。噶尔丹在沙俄的唆使下，对喀尔喀土谢图汗发动进攻。戈洛文利用这个机会，率领大批俄军袭击色楞格河和希洛克河一带的蒙古人民，对他们进行残酷的烧杀抢劫，妄图加以吞并。把侵占别国领土的扩张主义分子，屠杀别国人民的刽子手，美化为“英雄”，恰恰暴露了苏修继承了老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衣钵。

为方便读者起见，我们在本书末增加了参考书目和人名、地名、民族名、俄汉译名对照表。某些地名，除在表中表明我国固有名称外，还在译文内加了译者注。

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校内外许多同志的大力帮助，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1650年前与阿勒坦汗的通使关系.....	15
第二章 与北蒙诸汗通使关系的开始.....	54
第三章 十七世纪下半叶与阿勒坦汗的关系.....	74
第四章 缔结尼布楚条约时期的俄蒙关系.....	99
附录	
信四封.....	169
参考书目.....	175
俄汉译名对照表.....	179

引 言

目前对十七世纪俄蒙关系史研究得还很不够。我们不仅没有一部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甚至对十七世纪期间俄蒙多次互派的使团也没有一般的概述。然而，却又不能说历史文献完全没有涉及俄蒙关系，因为革命前的俄国学者的著作和苏联学者的著作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某些方面都曾进行过阐述。

因为十七世纪的俄蒙关系与俄国在东方的政策，更确切地说与俄国在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政策紧密相连。所以，首次涉及俄蒙关系这个题目的是研究西伯利亚历史的著作。其中包含有某些俄国使团前往蒙古诸汗的相当详细的资料，从中可以找到用以叙述俄蒙关系某些事件的几章或大段文字。而且这些著作还公布了不少档案材料。因此，对这些问题研究尽管还很不够，但仍然有相当大量的书目。根据公布材料的性质，这些书目姑且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以各种方式公布过的档案材料、各种文件和外交往来公文等等；第二部分包括研究西伯利亚、布里亚特蒙古和哈卡斯历史著作中的以及研究俄中关系著作中的历史文献资料。

最初几部关于西伯利亚历史的著作出自十八世纪的半官方历史学家米勒和菲舍尔的手笔，其中有不少关于俄蒙关系，特别是俄国同阿勒坦汗^①关系的资料。因为这些著作的作者把俄国同蒙古

^① “阿勒坦汗”是我国喀尔喀札萨克图汗的部属，并无汗号，只称“洪台吉”。康熙年间，清政府授予“札萨克”（旗的首领），属札萨克图汗中左翼左旗（即和托辉特部）。俄国人对硕垒乌巴什及其继承者也称“阿勒坦汗”（意为“黄金汗”。——译者

关系的历史看作西伯利亚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只局限于查证事实和记述历史事件而已。这些作者对俄国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对内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对蒙关系的政策都持维护态度。这几部内容丰富的著作，明显的主要优点是发现了很多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一些俄国使节的出使报告，并将其应用于科学研究。

安德里耶维奇的著作也是研究西伯利亚历史的半官方著作，但出书时间晚一些，内容的重要性也比前者小一些。安德里耶维奇在很多方面复述了十八世纪作者关于俄蒙关系史的资料，同时又补充了为数不多的新材料。他对莫斯科国家在东方的外交活动也是持维护态度。

十九世纪俄国档案专家的一些著作中也有俄蒙关系史上很有意思的材料。在这些著作当中，应当提出奥格洛勃林的文章——《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外交官》^①，这篇文章首次公布了关于西伯利亚哥萨克和图鲁海塔布囊的会见，以及俄国派出使团去车臣汗的档案材料。波克罗夫斯基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 1618 年蒙古和中国旅行记》^②一文尤其值得注意。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证明西伯利亚哥萨克伊凡·彼特林于 1618 年曾经完成了一次空前勇敢的中国之行。据我们所知，彼特林中国之行的真实性受到过怀疑，认为他的出使报告出自别人之手。但波克罗夫斯基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认真研究和鉴别，有说服力地指出这份出使报告确实出自彼特林之手。

法国历史学家葛斯顿·加恩的专题论文和英国考察家约翰·巴德利的两卷本著作对于我们研究这个题目颇有价值。加恩的论文^③是以俄国档案资料为根据，不仅利用了已在各种刊物上公布

① 《历史通报》第 46 卷，圣彼得堡 1891 年版。

② 《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报》，第十八卷，第四期，彼得格勒，1913 年版。

③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1689—1730 年)俄中关系史》，巴黎，1912 年版。

过的文件,而且还利用了俄国档案中的很多新材料。他的著作所论述的基本上是俄中关系的历史,只是在其头两章(“十七世纪末俄中之竞争”和“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俄国在远东的海关政策”)才有俄蒙关系的资料。

加恩认为,十七、十八世纪俄国在东方的对外政策是侵略性的政策,而俄满冲突则是两个侵略者的冲突。作者从俄国十七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总政策角度来分析俄国同蒙古诸汗的关系。加恩搜集了很多关于尼布楚条约的材料,相当详细地叙述了戈洛文使团的出使经过,并指出戈洛文渴望同蒙古呼图克图建立友好联系。加恩的书虽然不够客观,但对于研究俄蒙关系史仍有相当大的价值。

上面已提到巴德利的著作,^①这部著作共分两卷。第二卷搜集了许多有关俄国与喀尔喀蒙古人、与卫拉特人、吉尔吉斯人以及与中国人关系的俄国档案文件(其中包括出使报告)的英译本。巴德利所利用的大部分文件以前都曾在俄国刊物上公布过,他从莫斯科外交部档案馆所得到的一小部分文件则是首次发表。巴德利共发表了十六份出使报告(从1616年丘麦涅茨的报告开始到1675年尼古拉·斯帕法里的报告为止)。蒙古之行的七份报告中有两份是首次公布。出版时附有注释和短序。巴德利所作的注释和短序都说明他虽然不是东方学的专家,但精通用俄语和西欧语写成的古代东方学文献。巴德利著作的缺点是档案材料的译文不准确,他发表文件的英译本时,经常不是将文件全文发表,有

^① 约翰·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从十七世纪始,至沙皇阿历克赛·米哈依洛维奇死亡(公元1602—1676年)俄、蒙、中关系记录。主要以俄国沙皇或西伯利亚将军派往卡尔梅克和蒙古王公以及派往中国皇帝处的使者所书写或口授报告的形式写成。书中有历史、地理概论及反映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叶对北亚地理已有逐步认识的地图一套。书中引文大多是取自莫斯科外交部档案馆所存原稿,第1—2卷,1919年,伦敦版。

时还引用其他著作中的资料,最经常是引用菲舍尔所著《西伯利亚史》中的资料来补充本人的译文。在大部分情况下,作者在作这类文句增补时,都作了附加说明。有几份出使报告的译文也并非都很确切。巴德利的著作尽管有这些严重缺点,但是仍然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作者把很多零散的材料汇总在一起,增补了大量注释,由于书目索引编得很好,因而查阅方便,找出了不少新的材料并将其应用于科学研究。巴德利的著作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俄国与蒙古、卫拉特、中国交往的唯一有注释的大部头的俄国档案材料汇编。

大约四十多年前,巴德利的书在伦敦出版,份数非常少(有编号,总共只有250份)。关于巴德利的这本书科特维奇在1925年写道,“俄国档案材料的巨大意义现在更加清楚了。如果说英译本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前科学上的需要,那么,英译本出版后,俄国仍有责任着手出版尽量完整的文件原本”^①。这个愿望说出之后,已过去三十多年了,虽然苏联历史学家在一些文章和研究著作中利用了很多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材料,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版过一份俄蒙关系史方面的档案材料汇编。

俄蒙关系问题曾引起研究西伯利亚民族史的苏联学者,其中包括研究布里亚特民族史的苏联学者的注意。在奥克拉德尼科夫、库德里亚弗采夫、托卡列夫、哈普塔耶夫、鲁缅采夫、札尔金德和多尔基赫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和他们在档案文件中发现的新资料。上述作者在研究布里亚特历史时,对俄国人、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能忽视的。

在巴尔托利德、科齐明和波塔波夫阐述哈卡斯历史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关于俄国与蒙古诸汗,其中包括与阿勒坦汗交往的材料。这些著作部分地利用了从档案文件中所得到的新资料。

在格鲁木-格尔日麦洛那本很有价值的著作《西蒙古和乌梁

^① 《东方学家协会会刊》第一卷,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551页。

海边境》(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6年版)的第二卷中有一些关于俄蒙关系的片断资料。我们在讲述所研究的那个时期的第十章的注释和一些不长的段落里包括了这些片断资料。然而, 根据这些片断资料对俄蒙相互关系总的发展过程还不能得出一个概念。此外, 格鲁木-格尔日麦洛所运用的资料只不过是早已公布过, 为人所共知的材料而已。

奇怪的是, 蒙古史学专家毫不注意这个问题。除了科特维奇在《十七——十八世纪对卫拉特人关系的俄罗斯档案文献》^①一文中对俄国档案材料和卫拉特语、满语、汉语材料作了极为有意思的、内容极为丰富的概述之外, 我们就再没有见到这类题目的著作了。虽然这篇文章所分析的是对卫拉特人的关系, 而不是对喀尔喀蒙古人的关系, 但我们还是不能不提到它, 因为这篇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俄国档案材料对研究俄国在东方的外交活动所起的作用, 它已成为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经典著作。从它发表到现在, 已过去了将近四十年, 在这段时期所发表的几篇不长的文章, 虽然也涉及到了俄蒙关系史的一些问题, 但没有提出新材料。

不久前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莫斯科 1954年版)有个别章节论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些章节篇幅不大, 而且只有一般资料。

应当指出, 虽然公布了俄国书库里所保存的很多档案文件, 但都是分散在各种刊物上公布的。此外, 这些材料的选择又完全带有偶然性。很多材料和一些文件以及出使报告都发表和公布在《俄国历史丛书》(第二卷和第八卷)、《历史文献》、《历史文献补编》、《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十七世纪的历史文献》、《希尔科夫公爵文集》、米勒所著《西伯利亚史》的附录, 以及几期《红档》杂志等书刊上。在班蒂什-卡缅斯基所著《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

^① 《俄罗斯科学院通报》, 彼得格勒, 1919年版。

交文件汇编》、季托夫所著《十七世纪的西伯利亚》以及阿尔谢尼耶夫为《俄国使臣尼古拉·斯帕法里 1675 年自托博尔斯克经西伯利亚到尼布楚和中国边境的旅行》一书所写的引言等史籍里也公布过令人感兴趣的档案材料。

已发表的俄蒙关系史资料大体上就是这些。但对于正确理解俄蒙关系的发展，只有这些材料显然是不够的。不可避免地必须填补从 1616 年起到 1691 年止向蒙古派遣俄国使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

苏联的很多档案馆都保存着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莫斯科国立中央古代文件档案馆所搜集的十七世纪文件最为丰富。应当指出，我们从这个档案馆收藏的文件中所利用的档案有：1) 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卷宗和史籍(档案第 214 号)，这些卷宗和史籍收集了有关西伯利亚行政当局的活动以及与邻国关系的文件；由此可以发现关于向卫拉特和蒙古王公派遣使团的大量来往公文、使节的出使报告、训令、以及其他材料；2) 使节部的文件(档案第 126 号)，这些文件对研究俄蒙关系史也是必不可少的，“蒙古事务档案”和“中国事务档案”两部分尤其重要；3) 十七世纪下半叶伊尔库次克将军衙门的材料(档案第 1121 号)。

所谓《米勒存稿》是对上述三部分材料的补充。在这些存稿中包括西伯利亚地方档案馆十七世纪档案材料的大量抄本。十八世纪抄本在某些情况下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它们顶替了原本(西伯利亚的很多档案材料由于火灾而遭到严重损失)。《米勒存稿》一部分保存在国立中央古代文件档案馆，另一部分存放在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档案馆。这个档案馆还有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①、叶尼塞斯克^②和雅库次克将军衙门的文件抄本(档案第 21

① 即厄尔口城，下同。——译者

② 即伊聂谢柏兴，下同。——译者

号)。上面曾提到的米勒所著《西伯利亚史》头两卷的附录公布了《米勒存稿》中的一部分文件。俄蒙关系史中最有意义的文件应该发表在第三卷中,但直到现在第三卷仍未出版。除《米勒存稿》外,苏联科学院档案馆还有其他一些对我们研究这个题目很有用的档案材料。在这些档案资料中我们采用了伊拉里昂·罗索兴的手稿。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所保存的材料比上述档案馆所存的材料要少得多。

我们利用了伊尔库次克和雅库次克将军衙门的一些文件,其中有令人感兴趣但很零散的十七世纪末的材料(例如,噶尔丹和车臣诺颜写给伊尔库次克将军的信,这些信是用俄语字母写下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十七世纪蒙古语的语音;此外,还有一份关于抢劫布哈拉商人的残缺不全的材料以及一份被抢劫的商品清单。被劫商品清单的一部分保存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另一部分保存在国立中央古代文件档案馆)。我们这部著作就是以上面三个档案馆的文件作为基础的。

除了俄文档案文件以外,我们也使用了蒙文年鉴资料。应当指出,我们目前还看不懂蒙文材料,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档案研究得还不够,在这些档案中尚未发现与十七世纪俄蒙关系有关的材料。只是不久前在乌兰巴托^①才开始整理、清点从各艾马克^②档案馆和各部(衙门)档案馆收集来的丰富材料。可以预见,将来一定会发现有关十七世纪蒙古诸汗和俄国关系史的材料,但在目前我们只能局限于使用蒙文年鉴资料。在蒙文年鉴资料中,《亦勒特赫勒·沙斯特尔》对我们研究这个题目最有价值。这部多卷作品是后来成了满洲皇帝附庸的蒙古王公的传记和世系记事汇

① 即库伦,下同。——译者

② 艾马克(Аймак)行政单位——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为旗之上的部或盟。——译者